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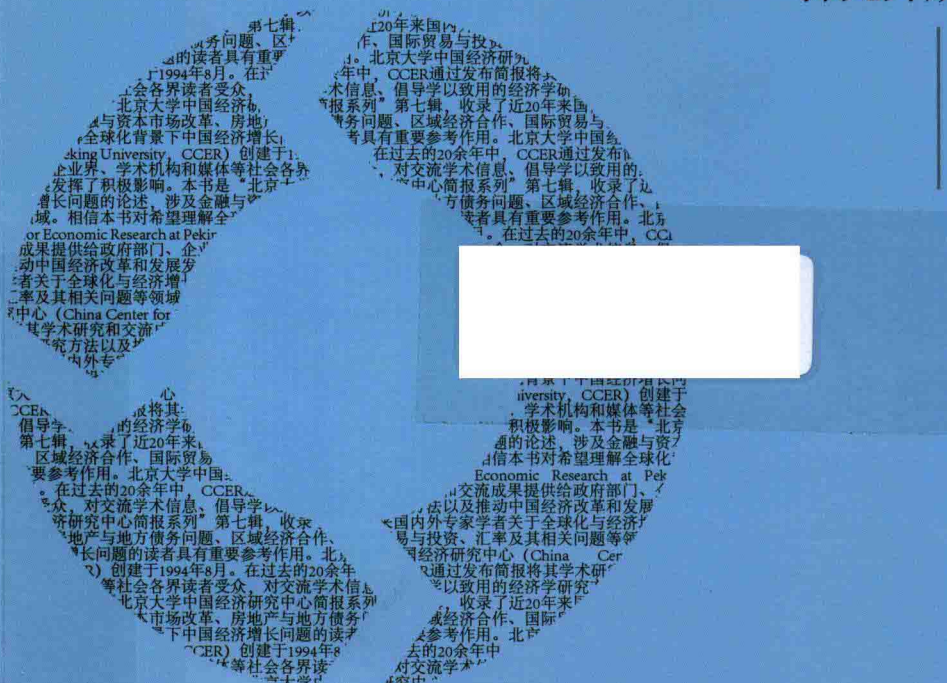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系列

XIANGHU YICUN DE
QUANQIU JINGJI

相互依存的 全球经济

探究开放型经济成长之道

卢 锋◎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系列（第七辑）

相互依存的 全球经济

探究开放型经济成长之道

卢 锋◎编



问题、区
1994年8月。在
会各界读者受众。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
与资本市场改革、
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
、Peking University, CCER)
、企业界、学术机构和媒体等
发展发挥了积极影响。本书是北
经济增长问题的论述，涉及金融与资本
等领域。相信本书对希望理解全
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at Peking
交流成果提供给政府部门、
及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
家学者关于全球化与经济
、汇率及其相关问题等
济研究中心 (China Center
简报将其学术研究和交流
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以及
20年来国内外专
际贸易与和
受中国
息、列
问题、区
了近20
济合作、国
有重要作用。北京大
在过去的20余年中，CCEK
、对交流学术信息、倡导学
研究中心简报系列 第七辑，
地产与地方债务问题、区域经济合
长问题的读者具有重要参考作用。北
) 创建于1994年8月。在过去的20余年
本等社会各界读者受众，对交流学术信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系列
资本市场改革、房地产与地方债务问
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读者具有
University, CCER) 创建于1994年
、学术机构和媒体等社会各界
。本书是北京大学
金融与资本市
点谈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探究开放型经济成长之道/卢锋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系列)

ISBN 978-7-301-26764-6

I. ①相… II. ①卢…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发展—研究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09904 号

书 名	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探究开放型经济成长之道 XIANGHU YICUN DE QUANQIU JINGJI——TANJIU KAIFANGXING JINGJI CHENGZHANG ZHIDAO
著作责任者	卢 锋 编
策 划 编 辑	刘 京
责 任 编 辑	梁庭芝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26764-6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子 信 箱	em@pup.cn QQ:552063295
新 浪 微 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经管图书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21.25 印张 504 千字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序

1994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1995年5月18日,中心发布“21世纪各国水稻生产和需求预测及其政策含义——国际水稻会议综述”,成为中心不定期整理与刊发简报工作的发端。我1995年10月回国到中心工作,林毅夫主任让我整理的第一份简报,是报道1996年2月世界银行就当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未定稿征求中国经济学家意见座谈会的内容。那次座谈会除中心林毅夫教授、易纲教授、张维迎教授参加外,还请到吴敬琏教授、赵人伟教授、刘鹤教授、郭树清教授、谢平教授等重要经济学家,此次会议纪要作为1996年第2期(总第9期)简报发布。此后我较多参与简报的整理工作,后来长期成为简报系列事实上的主编,即便2003年去哈佛大学访学大半年,借助互联网之便仍持续承担简报编辑工作。2013年年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领导决定让我转交这一工作,届时中心简报已刊发1000多期。

近20年来,中心简报编辑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做法。如简报刊载内容仅限于中心直接相关科研成果与学术交流活动,基本功能定位于将中心学术研究和交流成果提供给包括非经济学专业的政府部门、企业、学术机构和媒体等社会各界读者受众,文章篇幅在3000—5000字并且不包含数学公式和图表等。简报内容具体来源可分以下几类。一是中心教授或外请学者在中心举办的讲座和演讲,这方面内容约占所有简报的两三成;二是各类学术会议研讨内容的整理,如CCER-NBER年会已持续举办15次,每次讨论内容都整理出多期简报刊发,这类活动简报占总量的一半左右;三是中心研究人员的投稿,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专题研究成果的缩写稿,也包括就经济改革发展热点问题撰写的分析短文和评论。

中心简报发布后经常被财经类媒体广泛转载,林毅夫教授多次提到不同方面的领导在不同场合提及和表扬中心简报。一个机构能在近20年持续整理发布1000多期原创内容简报其实并不容易,中心能做到这一点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首先是由于中心学术科研活动密集,为简报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其次是中心领导重视,特别是中心创设主任林毅夫教授不仅经常为简报提供署名稿件,而且经常鼓励简报工作;再次是简报整理是一项“劳动与知识密集型”工作,整理人既要有相当好的经济学功底,又要有充沛的精力和工作热情,历届中心研究生都是简报整理的主力军,他们对1000多期简报贡献最大;最后是我们摸索制定了一套目标明确、职责清晰、格式统一、简单明了的工作流程,使不同时期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能在统一框架下作出贡献。

2004年以前我们已先后三次结集出版了截至2003年年底刊发的简报。2013年是中心成立20周年,在国发院领导姚洋教授的支持下,将2004—2013年简报部分内容挑选出来分四辑出版,2013年4月已出版第四辑《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中外经济学名家演讲实录》与第五辑《中美经济学家对话全球经济——CCER-NBER十五次经济学年会实录》,现在出

版第六辑《深化改革与推动发展——求解经济转型的热点难题》与第七辑《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探究开放型经济成长之道》。

我承担了十几年的简报系列编辑工作,为就职单位提供了一位教职人员应做的服务,同时也从中学到很多知识并得到各种教益。感谢中心历任领导对简报工作的支持,感谢不同时期很多研究生参加简报的整理写作,感谢中心行政工作人员对简报工作的帮助,感谢姜志霄、张杰平协助整理和校读文稿。最后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林君秀女士、刘京女士的支持与努力,使得这套简报的系列专辑最终得以出版。

卢锋

2016年1月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目 录

第一篇 全球化与经济增长

PKU-LSE “中国经济增长和全球化”研讨会简报之一（2005 年 8 月）	3
PKU-LSE “中国经济增长和全球化”研讨会简报之二（2005 年 8 月）	7
PKU-LSE “中国经济增长和全球化”研讨会简报之三（2005 年 8 月）	10
PKU-LSE “中国经济增长和全球化”研讨会简报之四（2005 年 8 月）	14
PKU-LSE “中国经济增长和全球化”研讨会简报之五（2005 年 8 月）	18

第二篇 金融与资本市场改革

“中国资本回报率”专题研讨会简报之一（2007 年 1 月）	25
“中国资本回报率”专题研讨会简报之二（2007 年 1 月）	30
“中国资本回报率”专题研讨会简报之三（2007 年 1 月）	35
“金融与经济发展”专题讲座简报之一（2009 年 10 月）	40
“金融与经济发展”专题讲座简报之二（2009 年 10 月）	45
“经济危机和经济学”座谈会简报之一（2009 年 2 月）	48
“经济危机和经济学”座谈会简报之二（2009 年 2 月）	53
“经济危机和经济学”座谈会简报之三（2009 年 2 月）	57
风险管理和银行监管改革会议之一（2013 年 4 月）	61
风险管理和银行监管改革会议之二（2013 年 4 月）	66

第三篇 房地产与地方债务问题

地方债论坛系列简报之一（2013 年 12 月）	73
地方债论坛系列简报之二（2013 年 12 月）	76
地方债论坛系列简报之三（2013 年 12 月）	79
地方债论坛系列简报之四（2013 年 12 月）	83
地方债论坛系列简报之五（2013 年 12 月）	86
“房地产与宏观经济国际学术研讨会”简报之一（2006 年 7 月）	89
“房地产与宏观经济国际学术研讨会”简报之二（2006 年 7 月）	93
房地产调控政策再思考（2013 年 4 月）	97

第四篇 区域经济合作研讨

第 22 届东亚经济研讨会简报之一 (2011 年 6 月)	103
第 22 届东亚经济研讨会简报之二 (2011 年 6 月)	106
第 22 届东亚经济研讨会简报之三 (2011 年 6 月)	109
第 22 届东亚经济研讨会简报之四 (2011 年 6 月)	113
第五届两岸经济发展研讨会简报之一 (2004 年 8 月)	116
第五届两岸经济发展研讨会简报之二 (2004 年 8 月)	121
第七届两岸经济发展研讨会简报之一 (2008 年 11 月)	125
第七届两岸经济发展研讨会简报之二 (2008 年 11 月)	129
第七届两岸经济发展研讨会简报之三 (2008 年 11 月)	134
第七届两岸经济发展研讨会简报之四 (2008 年 11 月)	137
第七届两岸经济发展研讨会简报之五 (2008 年 11 月)	142
第九届两岸经济发展研讨会之一 (2012 年 9 月)	149
第九届两岸经济发展研讨会之二 (2012 年 9 月)	152
第九届两岸经济发展研讨会之三 (2012 年 9 月)	155
第九届两岸经济发展研讨会之四 (2012 年 9 月)	158

第五篇 国际贸易与投资

挑战、机遇与前景——欧债危机与中欧合作 (2012 年 5 月)	165
中国对外投资圆桌会议简报之一 (2009 年 5 月)	170
中国对外投资圆桌会议简报之二 (2009 年 5 月)	17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研讨会之一 (2012 年 11 月)	177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研讨会之二 (2012 年 11 月)	181
“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政策研讨会”简报之一 (2007 年 5 月)	184
“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政策研讨会”简报之二 (2007 年 5 月)	190
“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政策研讨会”简报之三 (2007 年 5 月)	197
“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政策研讨会”简报之四 (2007 年 5 月)	203
“开放宏观视角下中国劳动市场”研讨会简报之一 (2011 年 6 月)	208
“开放宏观视角下中国劳动市场”研讨会简报之二 (2011 年 6 月)	212
“开放宏观视角下中国劳动市场”研讨会简报之三 (2011 年 6 月)	215
“开放宏观视角下中国劳动市场”研讨会简报之四 (2011 年 6 月)	219
“开放宏观视角下中国劳动市场”研讨会简报之五 (2011 年 6 月)	222
“生产网络、附加值和贸易统计改革”简报之一 (2012 年 9 月)	226
“生产网络、附加值和贸易统计改革”简报之二 (2012 年 9 月)	229
“生产网络、附加值和贸易统计改革”简报之三 (2012 年 9 月)	232

第六篇 汇率及相关问题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思考与政策建议（上）（2006 年 12 月）	239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思考与政策建议（中）（2006 年 12 月）	245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思考与政策建议（下）（2006 年 12 月）	249
“人民币汇率政策讨论会”简报（上）（2010 年 4 月）	254
“人民币汇率政策讨论会”简报（下）（2010 年 4 月）	259
“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金融对外开放政策”研讨会简报（上）（2012 年 3 月）	264
“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金融对外开放政策”研讨会简报（下）（2012 年 3 月）	269

第七篇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简报之一（2004 年 9 月）	277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简报之二（2004 年 9 月）	281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简报之三（2004 年 9 月）	286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简报之四（2004 年 9 月）	291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简报之五（2004 年 9 月）	294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简报之六（2004 年 9 月）	298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简报之七（2004 年 9 月）	301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简报之八（2004 年 9 月）	305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简报之九（2004 年 9 月）	310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简报之十（2004 年 9 月）	314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简报之十一（2004 年 9 月）	318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简报之十二（2004 年 9 月）	321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简报之十三（2004 年 9 月）	326

| 第一篇 |

全球化与经济增长

PKU-LSE “中国经济增长和全球化”研讨会简报之一

——新经济、人民币汇率、纵向专业化与贸易

(2005 年 8 月)

2005 年 8 月 22—23 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CCER) 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LSE) 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中国经济增长和全球化”研讨会。与会中、英两国学者围绕贸易政策、人民币汇率、经济增长模式、金融发展、私有化改革等问题展开讨论。第一期简报报道有关新经济、人民币汇率、纵向专业化与贸易等报告的内容。

Danny Quah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 新经济“新”在何处

Danny Quah 的演讲对全球化和技术进步背景下产生的新经济特征进行了界定，并且讨论了由此带来的贸易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问题。

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着眼于物质资本的增加和积累，根据经济增长模型可以预测，中国将在 2016 年超过除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但即使那样，中国人均收入仍然很低，并且由于不断增大的基尼系数，还会有很多穷人。

中国能够超过美国这一事实并不新奇，因为这是经济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几千年来这种结构变化一直在持续进行，这种变化并非新经济的实质所在。从供给方面来说，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发生着持续的结构变迁；从需求方面来说，从树皮到米粥到比萨，代表着持续不断的产品更新，这些都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新现象。同样，国际交往的日益扩大也不是最近才出现的，1870—1930 年就是一个全球化的黄金时代，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居民移民美国，欧洲居民移居到澳大利亚和南美洲，造成全世界约 1/7 的人口在出生地以外的地方工作和生活，资本的转移也在不断发生，因此，全球化的因素至少广泛存在了 150 年，它们并不是现在新经济的实质所在。中国超过美国也是这种趋势的必然结果，并不是新鲜事，因为这并没有改变经济增长的本质。

现代经济之“新”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经济的价值中包含了越来越多的“无形知识”，而并不是像原来那样，包含很多可接触的实物；二是终端消费者和无形知识的特殊关系，产品直接提供给终端消费者，不是以物质产品的形式，也没有众多的服务人员。在传统经济中，以技术和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源泉，人力资本参加生产的过

程,最终的制成品和服务提供给消费者,同时人力资本也在创造知识,促进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而在新经济的情况下,技术和教育不仅是知识的源泉,同时也为消费者所拥有,知识和知识产品直接提供给消费者,不通过中间环节,消费者直接享受知识产品。知识产品包括数码音乐、MP3、DVD、计算机软件、操作系统、药物等。

这些知识产品的特征是无形、非排他性、可以无限复制,第一件产品成本很高,但是复制的成本很低,传统的产权体系失效,传播不受物理空间和距离的限制。正如诺斯所言,缺乏合适的产权体系是抑制技术创新的主要原因。传统的福利经济学认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合适的市场机制下能够有效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然而,由于新经济改变了产品的属性,所以市场不再像以前那样运行,分权化的市场不再有效,传统的产权体系也不再适用。

卢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人民币实际汇率的长期走势

1978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化特点是,1978—1993年人民币实际汇率持续贬值,而1994年之后不断波动;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和名义汇率的变化相一致。这一现象被认为与国际经济学 Balassa-Samuelson 效应不相一致。为了解释这一现象,需要综合考虑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其中三个关键因素是:可贸易部门生产率的相对增长,价格和贸易体制的改革,中国国际收支账户的结构变化。

就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增长而言,通过比较中国和美国以及 OECD 十三国之间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发现在改革最初十多年间,中国相对美国以及主要 OECD 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显著提升,因而这一时期是没有劳动生产率相对追赶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特别是 90 年代后半期以来,中国制造业出现快速的劳动生产率相对增长。我国制造业这一最重要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增长的阶段性变动,对于理解人民币实际汇率趋势的阶段性演变,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

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进口替代战略,扭曲了许多要素的配置:农产品、原材料等可贸易产品的价格被人为压低,多数制成品得到了出口补贴和进口壁垒的保护,人民币名义汇率被严重高估。价格改革和贸易体制改革通过两种途径影响了人民币的实际汇率。首先,价格放开引起了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给人民币带来了贬值压力;其次,出口补贴和贸易壁垒的逐渐取消,也造成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在没有相对生产率增长的背景下,上述改革过程在较早时期引起人民币名义汇率持续贬值和实际汇率大幅贬值。到 90 年代初期,90%以上的零售商品价格和 80%以上的生产原料价格已经放开,而出口补贴也在 1994 年基本取消,由价格改革和贸易体制改革带来的人民币贬值压力得以缓解。这方面因素的作用对人民币实际汇率趋势变动也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

国际收支账户的结构变化也是影响汇率的因素。中国国际收支余额的变化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90 年之前,特征是资本账户盈余和经常账户赤字相匹配,同时伴随外汇短缺;第二阶段是 1990 年之后,特征是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的“双盈余”,逐步缓解了外汇短缺压力。国际收支账户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加工贸易是指进口原料和中间产品,生产并出口最终产品,其基础是产品内专业化(不同于行业间专业化和贸易,也不同于标准模型讨论的行业内专业化和贸易),这种专业化加强了现代的全球化趋势。数据表明,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资本账户余额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也有很强的相关性。

基于以上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决定因素的分析,分四个时期讨论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化机制。①1978—1993年,这一阶段由于可贸易部门的相对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不存在Balassa-Samuelson效应,而这一阶段总需求的增长引起的通货膨胀导致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体制性扭曲的不断消除也带来了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贬值,于是这一阶段人民币实际汇率表现为持续贬值。②1994—1997年,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经济过热带来的通货膨胀,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导致了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温和升值。③1998—2001年,这一阶段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加强了人民币升值的趋势,但不足以抵消导致人民币贬值的因素作用:国内经济周期导致的通货紧缩,东亚金融危机导致的人民币贬值预期等。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显著贬值,在名义汇率采取盯住汇率制条件下,实际汇率形成高估不平衡。④2002—2005年,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加强了90年代中期出现的人民币实际汇率上升趋势,宏观经济再次进入高速增长周期,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市场对人民币的贬值预期转变为升值预期,这一时期人民币实际汇率均衡水平显著升值,在盯住汇率制度下出现了人民币超额需求和实际汇率低估不平衡。

如果中国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继续相对提升,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会持续发生作用,需要适时地调整宏观政策和汇率政策来实现经济成长这一内在需要。从这一角度看,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实行的汇率改革政策,是朝正确方向走出的一步。

平新乔(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纵向专业化与中国的出口

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和外包存在密切关系。一方面,大多数发达国家将初级产品或中间产品外包给中国生产,因为中国生产这些产品有成本优势;另一方面,中国也使用许多其他国家的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来生产最终产品,然后出口到全世界。

中国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口的产品可以分为三部分:首先是FDI(外商直接投资),即国外厂商设计好产品原型,由其设在中国的辅助部门负责生产。其次,中国本土厂商开发出产品原型,根据“订单”为发达国家最终产品的生产商生产部件;外商设在中国的生产部门和中国本土厂商往往也都会进口部分初级原料和中间产品,以完成生产过程。最后,中国厂商进口生产要素,生产并出口最终产品。

本研究关注三个问题:①总的来说,纵向专业化(纵向专业化的衡量指标:进口原料占出口产品总产出的份额)占中国出口产品多高的比重?在过去十年,中国出口中的纵向专业化变化趋势是怎样的?②“中国制造”在世界产业链中的位置究竟如何?尤其是在中国的出口产品中,有多少成分来自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或者其他国家?③在中国的不同产业之间,纵向专业化程度有何差别?

厂商的数据来自1992年、1997年和2000年中国的投入产出表(包括129个部门,由于2000年的数据只有40个部门,所以只选取40个部门);贸易数据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1992—2003年的年度数据,包括40个部门)。

各个产业的纵向专业化程度变化有所不同。其中,测量仪器和文具的纵向专业化程度从1992年的20%提高到2003年的接近40%;通信仪器和计算机等电子产业的纵向专业化程度从1992年的19%提高到2003年的23%左右;电力设备行业的纵向专业化程度从

1992 年的 17% 提高到 2003 年的 24%；运输设备行业的纵向专业化程度从 1992 年的 19% 提高到 2003 年的 21%；皮革和毛皮制品行业的纵向专业化程度从 1992 年的 16% 提高到 2003 年的接近 17%，可能是由于政策原因，其中 1997—1999 年下降到 14%；纺织品行业的纵向专业化程度从 1992 年的 15% 提高到 2003 年的 16%（其中 1997—1999 年出现下降）。

研究的基本结论是：首先，1992—2003 年间，中国出口产品当中的纵向专业化比例已经从 1992 年的 14.8%（相当于中国每出口价值 1 元的产品，就包含 0.148 元的进口原料）提高到 2003 年的 21.8%，在十年间提高了 50%。其次，在所有纵向专业化份额当中，从日本进口的要素占了 1/5，而从韩国进口的要素，从 1992 年的约 0.5% 提高到 2003 年的约 3%。日本和韩国进口的要素合起来，大约 1/3 的纵向专业化来自日、韩两国。这意味着中日韩三国大致形成了一个产业链，向世界其他地区出口产品。最后，在中国所有产业部门中，纵向专业化程度最高的是机械制造业，纵向专业化程度最低的是公共服务业和公共饮食业。

PKU-LSE “中国经济增长和全球化”研讨会简报之二 ——中国经济增长与渐进式改革

(2005 年 8 月)

2005 年 8 月 22—23 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LSE）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中国经济增长和全球化”研讨会。与会的中、英两国学者围绕贸易政策、人民币汇率、经济增长模式、金融发展、私有化改革等问题展开讨论。第二期简报报道有关中国增长的真实性与可持续性、渐进式改革的报告内容。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与可持续性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真实性的质疑起因于 1998—2002 年的通货紧缩。一般而言，一国如果出现通货紧缩，经济增长会走缓或者停滞，就像美国 1929 年大萧条和日本在 1991 年开始的通货紧缩那样。中国零售价格指数在 1998 年下跌了 2.6%，1999 年下跌了 3.0%，2000 年下跌了 1.5%，2001 年下跌了 0.8%，2002 年下跌了 1.3%，直到 2003 年才恢复到正值，是典型的通货紧缩。但是公布的中国实际 GDP 增长率在 1998 年为 7.8%，1999 年为 7.1%，2000 年为 8.0%，2001 年为 7.5%，2002 年为 8.0%，5 年的平均增长率为 7.8%。这与发生在其他国家的通货紧缩和经济学理论中的通货紧缩相比，是不正常的。因此，经济学家开始怀疑中国统计数据的可靠性，支持这种怀疑的其他证据是中国的能源消费在 1997 年、1998 年和 1999 年分别减少了 0.8%、4.1% 和 1.6%。

但这种怀疑是不正确的，虽然中国的统计数据不是完全准确，但 GDP 的数据仍然是可信的。原因在于其他国家出现通货紧缩是由于金融或房地产泡沫破灭，使得国民财富缩水，导致需求降低，由此出现的生产过剩使得投资减少，消费和投资的下降必然导致 GDP 减小。但是中国此次通货紧缩的原因是不同的，中国从 1998 年开始了通货紧缩，但是并不存在股票市场或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更没有泡沫破灭一说。通货紧缩的原因在于供给超过需求，在其他国家发生的通货紧缩是由于消费降低导致投资较少，从而引起总需求下降，供给超过需求，价格持续下降；在中国此轮通货紧缩则是由生产能力过剩导致的。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出现了一轮投资高潮，由于当时强调“发展是

硬道理”，投资迅速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从 1981—1985 年和 1986—1990 年的 19.5%、17% 增加到 1991—1995 年的 37%，经过五年左右的累积，投资形成了三倍于以前的生产能力。但是消费并没有快速增加，所以改变了经济全面短缺的情形，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过剩局面。

能源消费降低是由于通货紧缩前后中国经济的技术结构变化导致的。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中国是典型的短缺经济，许多乡镇企业能够满足短缺之下的要求，因此它们在 80 年代繁荣起来，不过它们的技术水平和能源效率低。而 90 年代早期的许多投资来自国有部门、外商直接投资和合资企业具有较高的技术与能源利用率。当出现过剩生产能力时，大量乡镇企业破产，更有效率的新企业代替了乡镇企业，因此能源消费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减少了。

中国的通货紧缩是由生产能力突然增加导致的，没有家庭财富的减少，因此消费并没有急剧减少，1998—2002 年消费的平均增长率在 6.6% 左右。私有企业投资由于缺少好的投资机会而受到压抑，不过由于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公共部门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整体投资水平在 1998—2002 年的平均增长率为 11.7%，因此这段时间的 GDP 增长率可以有 7.8%，这个数据应该是真实的。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中很重要的决定因素，而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很大，可以以较低的成本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进行技术改进，促进经济发展，因此中国在未来 30 年中保持很快的增长是可能的。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的日本比较类似，日本依靠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发展了 28 年，创造了日本奇迹，亚洲四小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获得几十年的增长也是这个原因。中国现在的人均 GDP 只有美国的 2%，若 30 年之后可以达到美国的 20%，则需要年增长率超过美国 7 个百分点，美国人均 GDP 的年增长率在 2% 左右，所以中国可以有 9% 左右的增长率，考虑到人口增长因素，中国的 GDP 年增长率应该超过 9%。

中国有潜力在未来的二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保持快速增长，但中国在转型过程中也面临许多困难，例如收入差距问题、环境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国有银行问题等。相信中国政府和社会有能力克服这些困难，原因主要有：一是中国政府有能力保持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动员资源；二是人民的驱动，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有来自内部的推动力，人民要增加财富、改善生活，他们会抓住各种机会来获得改善；三是中国在技术进步方面的潜力非常大，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许多国际企业意识到中国市场对它们的重要性，因此在中国有许多外商直接投资，它们带来了新技术、新型管理方法和新观念，有利于中国的技术革新。

总结起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和能源消费率数据方面的不协调，引起了许多学者对中国统计数据的怀疑，这是因为他们是按照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分析中国问题的，如果从中国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就可以解释上述的不协调性。另外一点是中国政府有能力克服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Linda Yueh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

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保持了超过 9% 的经济增长率, 令人印象深刻。研究中国的增长模式会发现中国的独特之处, 中国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具有发展中国家的特点。中国在转型过程中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模式, 而不是大爆炸或休克疗法,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留了双轨制; 中国的改革是分步进行的, 集中于制度革新, 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对产权进行改革, 通过保留剩余的方式激励农民; 中国的改革过程中更多地采取了试验的形式, 允许部分地区或部门率先改革, 成功之后再向全国或全行业扩展, 例如经济特区的建立; 初始条件对于改革方式的选择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采取了由易到难的改革顺序, 避免出现大的冲击, 保持了社会的稳定。概括来讲, 中国渐进主义模式的特点是最小化政策贯彻执行的成本, 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 是最小化市场经济改革的政治阻力, 逐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 采取由易到难的改革顺序以试点方式逐步推动改革。

中国是采取渐进主义模式获得成功的典型, 现在也有一些采取渐进主义模式转型的国家。中国能够采取这种模式的前提是国内政治稳定, 可以支持改革初期的双轨制。中国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允许从事私有经济活动之后, 私有部门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国有部门。渐进主义的结果是很多艰难的问题遗留下来, 因为采取的是由易到难的改革顺序, 有许多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 包括私有化、金融和贸易自由化; 还有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有国内因素, 主要是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问题, 产生了宏观经济周期, 也有开放带来的不稳定性, 中国的汇率制度、债务市场都面临挑战。这些机构性问题的核心集中在国有部门, 包括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 国有银行主要将贷款贷给了国有企业, 累积了大量的不良贷款, 在发展过程中向城市倾斜的策略导致了城乡差距, 同时市场缺少规范的法制环境, 法律执行困难。

中国经济是外延型增长而不是内涵型增长, 即生产力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增加劳动力和投资, 而不是技术推动, 技术进步缓慢, 2001 年加入 WTO (世界贸易组织) 之后技术外溢的效应仍不明显。中国转型过程中的明显特征是投资超过消费, 而且市场很不完善, 缺乏正式的制度, 例如法律体系不完备。

中国由于采取了渐进主义的转型策略和接近市场的结构而发展较好, 但是这种改革模式下的增长模型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也面临许多挑战, 有许多艰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包括劳动力、利率和原材料等要素价格改革, 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所有制改革, 政府财政体系和货币政策运用改革, 劳动力过剩和缺少流动性问题, 城乡分割, 缺少包括健康保险、养老保险、住房保险和失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体系, 不完备的法律体系特别是执行体制, 金融行业中大量的不良贷款问题, 环境破坏等。

中国目前仍然不是市场经济, 只是部分市场化。未来经济增长很难继续依赖要素积累, 而是需要进一步提高生产力, 所以虽然中国有能力吸引并将继续吸引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 但是中国支持市场的制度基础薄弱, 缺乏配套的法律体系, 如果不解决好这些问题, 中国经济能否快速追赶发达国家很难判断。